

教育的失误与错位

——关于“韩寒现象”的思考兼与两位博士商榷

Thoughts on the Hanhan Phenomenon

宋 伟

(河南大学科研处 开封 475001)

“韩寒现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科学时报》为此展开了讨论。笔者认真读了几篇讨论的文章,尤其是在《科学时报》第43期“成材导刊”栏目下发表的两位博士的对话录,也想不揣浅陋,谈几点意见,兼与两位博士商榷。

一、韩寒是否应该成为一个大学生?

“韩寒现象”令今天的我国高等教育处于尴尬的境地。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学府,不仅要培养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哲学家,也应该培养文学家。就高校存在的目的和应具备的功能,无疑韩寒应该成为高等院校中文系的一名大学生,经过几年的正规系统的训练,为今后能真正成为文学人才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从韩寒获奖的3篇文章和他出版的两本书来看,他已经具备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的基本素质和条件,和在校的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相比,他不会是一个差等生。而且有理由相信,他会做得更好,很有可能成为一位优秀文学人才。

那么韩寒为什么断绝了进入大学校门学校这条路呢?因为他的数理化成绩很差。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数理化考试成绩很差,是否表明他不具备社会生活最起码的数理化的基本知识。比如他是否明白高压电是不能用手直接触摸的,是否明白水和酒精或者汽油的物质属性是有根本区别的,是否影响他作为一个作家对电脑进行一般性操作,等等。说白了,数理化考试成绩不好,是否可以表明他是一个傻瓜或白痴,是否影响他的正常生活。二是,数理化成绩很差,是否证明就不应该成为一个作家,也就是说,数理化的成绩和成为一位作家,有没有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

如果再进一步问,高考制度改革为什么要由全国统一命题考试转向3+X。“3”就是语文、数学、英语,X可以自选。这是否表明物理、化学对于实行3+X的考生来说,并不那么重要?果真如此,那么是否由此可以判断:学生因数理化成绩不好,就被高

中劝退或者不能进入大学学习,这种做法是没有道理的。

用过去20年高校招生的模式看“韩寒现象”,韩寒不应该成为一位大学生,他也考不上大学。但不要忘记,我国现行的高招制度急需进行改革而且已经开始改革。鉴于此,就不应该仍然站在过去高招制度的立场、角度看韩寒,而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韩寒。“韩寒现象”也从反面为高考制度如何改革提出了要求。

全面发展对于高中生们来说,当然对其今后高校学习或者走向社会,提供了综合知识的保证,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不过社会上确有那么一些人才的知识面并非多么广博,只是就其一点的精深而成为大家的。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陈景润虽然是一位著名的大数学家,可他对生活常识性的知识有时并不知道。古代许多哲学家、文学家,如李白、杜甫、苏轼,他们的数理化知识并不一定就比今天的高中数理化知识高出多少,可并不影响他们写出直到千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富有极大感染力的好诗词、好文章来。尽管时代不同了,当今是网络时代、高科技时代、计算机时代,可作为大众化工具的计算机知识,并不是高深的专业知识,只要懂得汉字的人就可以熟练操作各种汉字处理系统,充分利用计算机为自己服务。再说,今天的二月河先生,如果让他去考高中的数理化,能考多少分呢?王蒙先生、金庸先生,还有白墨、陈石两位博士,如果拿一份中学二年级的数理化考卷,他们能否考过韩寒?王蒙、二月河不照样成为著名作家,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金庸的武侠小说,不照样倾倒了全世界的华人!而二位博士不照样成为令人羡慕的博士吗!那么为什么就不该为韩寒让一条道呢!中文系的大学毕业生成为作家的毕竟凤毛麟角;而在当代著名的作家群中,仍有许多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他们并不因此而使自己的作品逊色。这恰恰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出了问题。二月河先生大概因为“文革”的原因,失去了到大学读书的机会。“文革”对教育造成

的灾难性破坏已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批判，难道我们容忍批判过的东西再死灰复燃吗！

早在2000年以前，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就提出了“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实现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既重视学生的共同要求，又注意培养和重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特长，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可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则是反对和扼杀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这不能不是我们教育的失误。

二、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才观？

既然有些作家没有大学教育的经历，可以照样成为著名作家，那么为什么非要韩寒进入大学不可？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就是为什么产生韩寒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在今天衡量一个人是否是“人才”的重要标准，有时就看你有没有大学的毕业文凭。如果没有大学毕业文凭，你的能力再强、成绩再大、贡献再多，也没有你的用武之地，人家也不承认你的人生价值。相反，如果你没有什么大的能力，只要有一顶博士帽子、一本博士学位的文凭，你就可以以专家自居。社会上评职称、晋级、提拔，等等，哪一条不和文凭挂钩！韩寒虽然出了书、成了名，但并没有成就感，相反却因为自己被大学拒之门外，感到沮丧，认为自己的人生失败了，所以他才发出了批判当今社会的声音。这不是韩寒的过错，而是当今教育制度的毛病。媒体之所以非常热心地关注韩寒的命运，并形成“韩寒现象”，也是因为人们非常关心当今教育改革和教育问题。

难道只有进入了大学，拿到了大学文凭才是人才吗？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虽然自学做出了一定成就，也不承认其为“人才”。这种狭隘、片面的人才观，其危害是巨大的。我们的人才观急需改变。

假如韩寒不是获得了作文的全国大奖，而是获得了数、理、化其中一门的奥林匹克国家或省级竞赛的前几名，他将会是什么样的命运？想必他肯定会保送到全国著名重点大学学习。这是否反映出我们人才标准的不一致性，或者说对文科有偏见？

不应该忘记，前些年媒体报道的大学生的汉语知识的浅薄、汉语作文能力的低劣、汉字书写水平的笨拙。据报道，有所著名大学的大学生语文考试竟然有一半人不及格，可是因为这些人的数理化和外语成绩很好，所以他们能成为大学生，也就成为了人才。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培养偏才。少数自然科学的博士，对中国5000年悠久文明史的无知、对中国近代史的欠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概否定，已经达到何等让人惊讶的地步！

因此可以看出，“韩寒现象”的实质反映出一些人不正确地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分离，反映出我

们的人才观有偏差。殊不知，自然科学是科学，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自然科学是立国之本，社会科学不仅是立国之本，也是立心之本。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现象，应该在我国的教育制度改革中得到纠正。

三、两位博士谈了些什么？

发表在8月24日《科学时报》第43期“成材导刊”栏目下的“泡沫上的舞蹈——透析韩寒现象”一文，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白墨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陈石博士的对话录。两位博士高屋建瓴，从文学创作与社会现象问题入手，来评价分析“韩寒现象”。笔者仔细研读了谈话录，觉得有几点疑问，斗胆提出来与两位博士商榷。

谈话录的第一部分，对湖北一位高考考生的作文提出批评，由此引出对“韩寒现象”的思考。湖北那位高考得满分的作文，笔者从《科学时报》上也读了。两位博士对这篇作文打满分不以为然，觉得只能给60分。在这里笔者自然不必要再评价这篇作文，但我想考官给满分肯定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分歧会这么大？这说明了什么？我认为这恰恰说明了我们的高考制度的缺陷与无奈。如果这篇文章让这两位博士批改，考生命运如何，不言自明。

第二部分是对韩寒作品的评价。这部分内容比较多，主要观点是：韩寒作品“仅仅是中国学生记叙文平铺直叙的反映，语言也很直白”；“缺少内涵”；“思想贫乏，语言常有故作高深的痕迹”；“所表达的主题并无新见”；“这篇获奖作文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给人的感觉他们不是在评价一位中学生的作品，而是摆出一副时下正流行的批评名人作品的架势。当然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出发，无可厚非。试想对鲁迅、金庸这些大师的批评，今天不是很时髦吗？尽管这丝毫无损大师们的形象。

第三部分是对韩寒本人的评价：“从《三重门》和对韩寒的一些访谈，可以看出，韩寒身上有许多传统愚昧的思想和品质”；“韩寒是一个非常错位的人”；“作为一个少年，他对我们的社会变得冷漠和没有激情，失去了他这个年龄应有的浪漫和热情，这是一种时代病”；“讲得极端一点，韩寒让人想到文革时期的黄帅……两个不同时代的反潮流的中学生的思维方式是如此地一致，一个主张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一个主张我是文学偏才，何必学数理化，进一步讲，在两个人的意识深处，就是狭隘的功利主义，就是目光短浅的小农意识”；“我不明白国人为什么如此执迷于这种小农意识，也不明白以富有历史感自诩的国人为什么这么健忘，而一再犯简单的历史错误”。

首先纠正两个简单的错误。“文革”时期，作为

反对“师道尊严”的反潮流小英雄形象的黄帅,不是中学生,而是小学生,并且黄帅也没有提出“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两位博士把“文革”时期另外一位教育制度下的牺牲品当作了黄帅,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1973年7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学生张玉琴在试卷上写下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照样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的班,还埋葬帝修反。”她遭到批评后,自杀了。这就是“文革”后期震惊全国的“马振抚公社事件”。

“文革”时期的“马振抚公社事件”和黄帅,对于今天的韩寒来说,实在太陌生了。将韩寒与黄帅相比,韩寒难以承受得起,也未免有些冤枉。不知道两位博士为何竟然将韩寒比作黄帅,且下结论说两个人有一样的思维模式。这是否有文革时期动辄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遗风”之嫌?如果没有“文革”时期的思维定式,怎么会如此联想?而且其“丰富”的想象力着实让人感到可怕!

黄帅、张玉琴是特定历史时期被政治斗争利用的牺牲品,但韩寒并没有被人利用,今天也没有人利用韩寒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二者有着本质的差别。今天媒体不断报道中小学生对学习压力或者因乱收费上不起学而自杀的事例,且媒体往往对自杀者给以极大的同情,对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给以激烈的批评。如果按照二位博士的逻辑推理,今日之自杀者该不是都在模仿张玉琴吧!今天的媒体该不是也在翻老账,在为张玉琴翻案吧!如此看来,将韩寒和黄帅联想起来实在是毫无道理。今天的“韩寒现象”,又怎么可能是“文革”时期所犯错误的简单重复!

谈话录对“小农意识”的思维方式,大加嘲讽和蔑视。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小农意识”,怕陈博士心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只不过是手中的一顶“帽子”,乱扣给别人罢了。“韩寒现象”怎么折射出了小农意识?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

(上接第49页)

看,一般规模都很大,但也有例外。我们是否要去效仿它们建成大规模甚至超大规模的大学,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通过合校提高学校现有水平、培养出更拔尖的人才、为国家和社会创造更大的成就,最终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这种想法固然是积极的。但同时需要看到,如果我们创建一流大学,落后的教育观念、办学思想、管理体制等不作相应转变、改革,即使规模再大、投入再多也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可以在一二年时间里造成一幢漂亮的大楼、建起一片新校区,但要使教学与研究的整体水准上一个台阶,要孕育一代创新人才、诞生一批创新成果却要困难得多。因此切不可认为一流的投入、一流的规模(学科门类齐全)必有一流的教育产出(包括培养一流人才、出一流教育成果)。相反,如果我们

解。

依笔者看来,韩寒身上所反映的不是失去了他这个年龄阶段应有的浪漫和激情,恰恰相反,在他身上却洋溢着年轻人的朝气、热情和浪漫。缺少浪漫、热情的时代病,有没有?有!而且很普遍,只不过没有体现在韩寒身上,而是表现在那些天天为高考拼死累活地死读书、死做题而缺乏创新意识的学生身上。

四“韩寒现象”的社会意义到底是什么?

韩寒并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笔者也没有必要袒护他的缺点,也不反对两位博士对韩寒知识欠缺的批评。韩寒的盲目自负让人难以接受。正如前面谈到的那样,韩寒对社会的批评以及他的自负,有其社会的原因。对此应该进行积极引导,这也是我们教育的任务。“韩寒现象”说到底是一个教育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审视这一现象,不能脱离教育这个圈子。离开教育问题,说别的,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不利于正确看待“韩寒现象”,而且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也没有什么益处。

教育的失误、错位,导致了“韩寒现象”的出现。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不重视人的个性差异,追求共性,扼杀个性;没有把被教育的对象当做一个创造性的人来培养,而是当作一个机器的零部件来铸造,即用一个固定不变模式来塑造人,因此培养的人才缺乏创造力、缺乏激情。没有今天对应试教育的批评、对素质教育的追求,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教育问题的反思,也就没有“韩寒现象”的社会化。“韩寒现象”带给我们的思考应该是积极探索解决当前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培养出更多的人才,真正实现普天下的“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也正是“韩寒现象”的社会意义。

(责任编辑 肖庆山)

能办出特色,在某些学科上具有国际影响力,而不是刻意地追求规模和学科齐全,也会得到国际上的认可。这应当是我们创建一流大学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王大中. 抓住历史机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1999(4)
- [2] 杜作润. 再议创一流大学问题——案例举隅. 有色金属高教研究,1999(4)
- [3] 李进才. 世界一流大学办学水平的启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
- [4][5] 葛苏林. 模糊子集,模糊关系,模糊映射.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7,22
- [6] 肖位枢. 模糊数学基础及应用. 航空工业出版社,1992,45

(责任编辑 肖庆山)